

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纪亚光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不仅率先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和策略,以及建党的组织原则、方法和步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不仅对建党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还致力于建党的行动与实践,为旅欧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源自于使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进而实现民族复兴与人民解放的时代要求。他能够在完全没有共产国际等外力因素作用下,相对独立地形成完整的建党思想并致力于卓有成效的建党实践,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非来自“俄人移植”、“共产国际扶植”,而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 蔡和森; 建党思想; 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2-0074-07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蔡和森建党思想进行考察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形成热潮,成果斐然;但同时,鉴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苏联、共产国际和日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新史料的挖掘和新观点的提出,将蔡和森建党思想置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再思考,也是必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非陈独秀、李大钊直接指导的结果,也非共产国际帮助与扶植的产物,而是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可以说,蔡和森与陈独秀、李大钊一样,他的建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原点之一。聚焦于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植根于20世纪之初深厚的时代背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走在时代前列的仁人志士因之而聚集,而非单纯的“俄人移植”、“共产国际扶植”所能造就。

一 从崇拜墨子到接受列宁学说

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直接来自于对列宁学说的选择与接受。对于列宁学说,蔡和森一见如故,欣然接受。1918年7月21日,正在北京为留法勤工俭学奔波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表示:“若天下治乱,其转移在于一心,人之贡献于人道,其功过不在形迹之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

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1]8-9}蔡和森将墨子与列宁并列提出,表明他对列宁学说的接受与其对墨子的推崇息息相关。

蔡和森出生于1895年3月30日。这一年,清政府因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进入到改良与革命并驾齐驱的社会大变革新阶段。这动荡不安年代,注定了蔡和森一生与中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家道中落,蔡和森在13岁时便不得不辍学到亲戚开的辣酱店当学徒,受尽作为本家长辈的老板欺侮压迫,促使年幼的蔡和森对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压迫关系产生了深入的思考,也培养了他刻苦学习、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1915年,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蔡和森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在陈独秀等抨击孔子思想的启发下,蔡和森开始对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产生强烈兴趣。据沈宜甲回忆:“那时,和森受古人思想影响最大的为墨子,我也是如此。”^{[2]135}蔡和森认为,现在的社会动乱,正是由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乱者不得治”;归根结底是人们缺乏“兼爱”思想所致。蔡和森还把墨子说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解释为让天下人过饱食暖衣、和平幸福的生活;把“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解释为要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就要不惜牺牲自己的

[收稿日期] 2015-02-02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重大项目“现代化视阈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 纪亚光(1969-),男,河北唐山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富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切,即令屈节辱身,也在所不辞。

因此,蔡和森在少年时期便对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热情。他提出:作为中国青年应以洗雪国耻为己任,以国家富强为奋斗目标。为此,他编写了一份《中国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贴在学校大礼堂墙壁上,痛诉中华民族的这段屈辱历史,以激励师生的爱国热情。他经常对同学说:“做一个中国青年应该立志,团结一切爱国人民,拿出力量来抵抗列强,洗雪国耻!特别要组织全国青年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奋斗!”^{[3]27-28}为深入了解社会,1918年春,蔡和森与毛泽东“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路上还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问题”^[4]。这次游学经历使蔡和森对湖南的农民状况有了一个深刻认识,并意识到失业、贫穷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改变这种状况,只能彻底变革社会。正如蔡和森对葛健豪所讲:“天下贫苦农民是一家,只要乐于助人,走遍天下也不难啊!”^{[3]42}

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其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5]34}新民学会有着严格的入会条件和学会纪律,保证了其能够成为坚强的革命团体,是包括蔡和森在内很多会员日后成为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基础。对于蔡和森而言,新民学会的成立,为其建党积累了经验,是其日后投身于建党活动的第一步。

1918年6月23日,受新民学会委托,蔡和森只身赴京筹办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正是这次远行,进一步打开了蔡和森的视野,也促使他首次接触到列宁的学说。

抵达北京后,蔡和森即结识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经常往来北大,这为蔡和森接触先进思想提供了条件。1918年7月,受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影响,蔡和森开始接受列宁学说。在1918年7月21日和7月24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懵懂地表达了对列宁学说、苏俄革命的认可,表示:“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1]26-27}蔡和森将列宁与墨翟、茅原华三对比,表明此时他对列宁、茅原华三的认识还不准确,但同时也说明蔡和森关于革命的思想已经有了俄国、日本两个参照系。同年10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

的胜利》两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宣传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受此影响,蔡和森的思想也逐渐转向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据当时在与蔡和森同在保定布里村学习的唐铎回忆:“在布里村学习期间,特别是到后来,他就很少谈论墨子而是更多的谈论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老农专政等等最新鲜最生动的东西了。那时他说过列宁在苏俄实行的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对列宁、苏俄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大加赞扬。”^{[2]99}当时同在布里村任教的沈宜甲也认为,此时蔡和森已接受列宁学说:“和森于一九一八年即向我云:‘崇奉共产主义,承认苏俄为世界牺牲’。”^{[2]138}

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促使蔡和森向往列宁学说。五四运动期间,蔡和森多次带领赴法预备班的湖南青年参加请愿活动。据当年参加过请愿活动的唐铎回忆:“我们湖南的一些青年,包括陈绍休、贺果和我,在和森同志带动下,与北京法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参加了这次示威请愿活动。……我们自新华门前的院子里坚持了一天一夜,晚上露宿在那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各界人士出于爱国热忱,纷纷送来饮料和食物,更使我们忘记了疲倦,增强了斗志。”^{[2]100-101}这一亲身经历,使蔡和森对帝国主义国家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也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促进了他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觉醒,并看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方向。可以说,蔡和森是带着进一步求索列宁主义的明确目标奔赴法国的。

二 率先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迅猛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兴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一步拓展了由欧洲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渠道。蔡和森无疑是这个群体中先知先觉的代表。

与绝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不同,蔡和森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憧憬踏上法国土地的。因此,到达法国后,只要有机会,蔡和森便向周围的人宣传共产主义。2月初,蔡和森与早已先期抵达的萧子升会面,双方针对效法俄国革命道路一事而展开争论。据萧子升回忆:“他对我说:‘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润之,说俄国一定要派人秘密来中国,来组织一个共产党。而且这事应马上进行。我认为在这事上我们应效法俄国,并且应马上进行。……俄国人的计划已经齐备,都写在了纸上让我们去读,

而且他们自己已经付诸实践。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别做别的尝试呢?”^[6]当然,此时蔡和森认定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只是基于中国国内对俄国革命的零星介绍,对于如何走、该怎样做不是十分清楚。为尽快获取真理,蔡和森在法国期间既不勤工,也不愿入学校学习,而是特立独行地选择自学,“日看法文报一节,因校中功课浅,及求知欲切,决计不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1]32}

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蔡和森便“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1]33}。1920年6月22日,萧子璋在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中亦提及蔡和森的法文学习状况,“和森在校,完全自修,法文可看报,生字不多了”^{[5]493}。到7月底,萧子升给毛泽东的信中则评价:“和森到法,即卤莽看报,现有进步。”^{[5]138}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己到法国后“卤莽看法文报,现门路打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1]55}。

在学习法文之外,蔡和森亦有意识地了解西欧各国政治、政党状况。尽管只是通过《人道报》等法国报纸了解俄国和共产国际的状况,但是并不妨碍蔡和森“蛮读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据许德珩回忆,自己刚到巴黎后不久,蔡和森便邀请其赴蒙达日,以便了解国内时事。在一天多的聚会和接触中,大家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蔡和森一手持《人道报》,一手持字典蛮读猛译的情形,给许德珩留下了深刻印象^[7]。据李维汉回忆:“他没有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时间内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8]176-177}据萧子璋回忆,到1920年7月,“和森同志已从法语硬译了《共产党宣言》,并用纸抄成一张张的小字报形式贴在教室的墙壁、书柜上,和森向我们大家进行解释讲解。”^{[8]197}由此可见,蔡和森阅读的主要是法共《人道报》、《平民报》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研译了列宁的部分文章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部分片段”^[9]。

正是凭着湖南人特有的“吃得苦、霸得蛮”精神,蔡和森获得了不少关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近正汇译德国政变与其社会、共产、工团各党消息寄你,起自社会民主党之分裂,以迄此届选举终结,故须等至六月中旬始能告竣”,“我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二年不活动,专把法

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一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克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综合此四者而成一调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个主义之上——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加番研究,一年中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一年后兼习说话听讲”^{[1]33}。可见,经过将近四个月的学习,蔡和森认为自己还需要两年时间学会法语、看懂法文书籍,但是语言不通并不能阻止蔡和森欲了解欧洲革命的急切心情。6月13日,蔡和森向国内介绍法国五一劳动节大罢工的情况,比较了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的工团主义,并分析了工团、工团联合会、劳动联合总会的组织关系以及组织的罢工运动。关于法国共产党的情况,蔡和森分析“在法国内阴谋的机关有三个”:分别为“木斯哥第三国际社会党的委员会”、“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的法国那一部分的共产党”、“苏维埃共产党联合会”,统一社会党已决定脱离第二国际社会党,而加入第三国际^{[1]53-54}。可见,通过直接阅读法文报纸、书籍,蔡和森已经对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与共产党有所区别,对欧洲工人运动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随着“猛看猛译”的深入,蔡和森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渐趋成熟,进而明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1920年7月5日至10日,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于蒙达日开会。会议决议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是关于改造方法,经与会者极力讨论,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7月7日,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萧子升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革命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和和”。对于萧子升的观点,蔡和森“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赞周谓现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较难”。李维汉则更赞同萧子升,认为“对于俄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这次会议对于新民学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被罗学瓚称为“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一个盛会”^{[5]115}。

受材料所限,我们无法得知蔡和森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详细思考,但从“无产阶级专政”、“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复详述现今世界大

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等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到此时其建党思想脉络已较为清晰。

三 系统提出建党主张

继1920年7月明确提出“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后,蔡和森随即在同毛泽东和陈独秀的书信往来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建党、怎样建党、建党的原则是什么等问题。

在中国为什么要建党这一问题上,蔡和森主要是“以世界大势律中国”这一视角来思考的。

(一)世界上“两个敌对的阶级”势必引发“阶级战争”

蔡和森认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1]67},“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三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1]79}。虽然同受资产阶级的压迫,但因“西方大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贿赂笼络而不自觉,社会党、劳动党中改良主义投机主义盛行”,而“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俄国的十月革命的爆发,就是其具体产物^{[1]78}。

(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蔡和森明确指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1]75}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呈现出如下四种新趋向。其一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俄”,其二是“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小产地方——中欧及巴尔干战败诸国”,其三是“阶级革命酝酿的地方——五大强战胜诸国”,其四是“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1]55-56}。他特别注意到,这四种世界革命运动形势并非孤立存在,“万国共产党即世界革命的总机关,这是无产阶级极彻底的、极真实、极具主义方略的、真正的国际组织,与没气焰的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针锋对立”,正在形成声势浩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70}。

(三)世界大势、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促使中国必须成立共产党

蔡和森认为,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大势所趋。其一,“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

能外此。”^{[1]56}其二,世界大战将再起,而战争“必在中国”,应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以提前有所准备^{[1]76}。同时,“以世界大势律中国”,“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必须“趁此时加一番彻底的组织。”^{[1]75}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他进一步就此说明:“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理想家、大学问家都也把持不下地。”^{[1]79-80}

鉴于严峻的形势和“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的现状,蔡和森反复强调要组织共产党,而且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与俄国完全一致的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1]58}“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1]73}

对于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党,蔡和森也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1]57}同时,蔡和森认为,成立中国共产党,不能拖延,“现在就要准备”。他预测,“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因此,中国需要成立共产党,以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对此重任,蔡和森希望毛泽东来承担^{[1]57}。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蔡和森不只是希望毛泽东早日准备建党,自己也将建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说:“我在这面业已酝酿组织,将于此早组一整队赴俄工作(二年内)。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男女长驻工作。拟于今冬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1]58}

在如何组建中国共产党问题上,蔡和森最初是按照俄国的经验来构想的。他在1920年8月1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甚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塞维克。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全国各机关,列宁亦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1]58}经过进一步思考,在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他对

建党的步骤有了更为具体、细致的四步走构想：“(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组织研究宣传部之外,更可组织一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1]75}

对建党的原则,蔡和森敏锐地提出了“应注意而不可游移”的两点意见,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二是“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1]60}。

无产阶级专政是蔡和森为实现改造社会理想而选择的途径和手段。他明确表示:“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1]83}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较之力图永久维护自身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是“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目的在取消阶级”,实现世界“和平大同”^{[1]56-57}。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不是“以暴易暴”,而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针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诘难,蔡和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进而,他明确表示:“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1]76}

蔡和森在思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组建中国共产党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时,特别强调其“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蔡和森认为:“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1]82}因此,中国共产党应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融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之中。他不仅就此在理论上进行了充分阐释,而且在致信毛泽东时,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朝鲜、日本、波斯、印度、土耳其都应有人去,尤以日本为重要。我意日本要去一个极重要的人。与去俄国一样的重要,望你注意!我意中日间要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只要有成熟的联络,谁先谁后不成问题。”^{[1]59}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蔡和森所力求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主义明确”的党,是注重通过“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理想的“方法得当”的党,是“原理方法”都“与俄一致”的党。因此,他的系统建党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源头之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四 几点思考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俄人移植”说与“共产国际扶植”说影响甚广。日本学者石川祯浩通过对中国、日本、朝鲜共产党的成立相比较,“产生这样一个单纯的疑问,即共产党在东亚成立,为什么是巡着朝鲜、中国、日本这样一个顺序?”他认为:“这个原因,不用说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其后共产国际在东亚各国进行的推动工作。实际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存在,才是造成共产党按完全相反的时间顺序在日本、中国、朝鲜成立的真正主要的原因。”^{[10]5-6}他进而指出:“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共产党,至少,当时的所谓‘共产党’的成立,首先要视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否作为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支部)而定。”^{[10]8}台湾学者陈永发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转向、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代潮流有关,也与共产国际输出革命有关。“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援助不仅攸关陈独秀的存亡,共产国际代表也实际参与了陈独秀建党的过程”,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下,陈独秀决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

如上观点,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置于共产国际的背景下,扩大到东亚三国共产党成立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但如果我们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建党活动纳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视野中考察,则发现如上阐释值得商榷。

首先,基于蔡和森建党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纵向历程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苏俄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有组织地“移植”痕迹。同时,查阅前苏联及共产国际揭秘档案,也没有相关的活动记载。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并非共产国际输出的结果。

其次,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率先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也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直接指导的结果。

据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来华的直接推动下,陈独秀开始接受列宁主义。同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等5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发起组。不过,据施存统回忆,该发起组起草的纲领是根据几本有限的马克思著作拟订出来的,其中虽有“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字样,但不解其意,“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12]232-233}据考察,该发起组名为“社会共产党”^{[10]165},进一步说明了该发起组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追求上还有较大的距离。直到7月1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召开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时,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始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12]251}。同年9月,在复刊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诸多信息表明陈独秀已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是该号刊登了标志陈独秀彻底转向列宁主义的文章《谈政治》,二是该号开辟了专门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三是该号“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12]234}。

显然,如上种种迹象表明陈独秀彻底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在1920年七八月间。对此,最早开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蔡和森认为,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是他“由美国(即资本主义)思想变为俄国思想”,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12]241}。同时,从1920年7月19日陈独秀等决心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时间点上,也很清楚地显示出晚于蔡和森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10天以上。无论从接受列宁学说的时间,还是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蔡和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并非受陈独秀的直接指导。

有研究者引用张国焘的回忆,证明蔡和森在法国的建党活动是受陈独秀的指导而展开。在回忆录中,张国焘写道:1920年7月底,“陈独秀与张国焘讨论建党问题,对湖南和留法学生作了乐观的预测,函请毛泽东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最有希望,陈独秀将与著名的马克思青年学者蔡和森通信,并请他在德、法等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的组织。”^[13]显然,这段回忆,要么是张国焘记忆有误,要么是张国焘故弄玄虚以彰显自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的地位。因为陈独秀与蔡和森的通信,是在1921年2月;而事实上,陈独秀委托赴法进行建党工作的,也不是蔡和森,而是赵世炎。据唐宝林考证,赵世炎于1920年5月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最早的建党活动,二人得以相识。“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学教授张申府因赴法国任教,陪同

前往,路经上海。陈独秀给张写介绍信,嘱其到法国联系赵世炎,进行建党工作。”^{[12]261}“于是张申府到法国后,先与赵世炎、周恩来成立起共产党小组,然后组织了名为‘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青年组织,分别接受国内党、团中央的领导。”^{[12]261-262}

再次,从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影响看,他不仅提出理论,也有建党实践,并在实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蔡和森是以自学求真知,但他从未将所思所想局限于个人的世界,而是怀抱着改造社会的志向,不断影响他人。据李维汉回忆:“和森同志到法国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收集了许多马列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的小册子,‘猛看猛译’。一面讲给我们听,一面写信到国内进行传播。我当时的年纪小,文化水平又不高,这些著作中所讲的道理一时接受不了。但是,从蔡和森等年长的一些同志的谈话或辩论中,我也已经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好。”^{[2]104-105}在蔡和森的影响下,原本立志教育救国的向警予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5月16日,向警予撰写《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坚信:“二十世纪的新人生观,是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来替代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这是可以深信无疑的。”^[14]除向警予之外,蔡和森也积极帮助其他人转变思想。据郑超麟回忆,蔡和森曾特意派欧阳泽从蒙达日到墨兰,住在尹宽家,天天同尹宽讨论问题,最终使尹宽从复杂思想中走到马克思主义来。就是这样,蔡和森“不仅在新民学会的旅法会员中间而且在全体勤工俭学学生中间,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遥遥领先的”^[15],并引导其他勤工俭学学生走向马克思主义。

除了如上一对一的思想影响,蔡和森还努力改变“工学世界社”的思想。在新民学会之外,赴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受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于1920年2月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由于该组织成员中有多位新民学会会员,他们在参加7月召开的新民学会蒙达日会议后,受蔡和森思想影响,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同年10月,“工学世界社”在蒙达日公学召开社员大会,蔡和森应邀出席。蔡和森的出席,对于“工学世界社”社员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参加会议的唐铎回忆:“我记得,和森同志讲的主要是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会上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主张工读主义,坚持勤工俭学到底;有人主张用无政府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和森同志在会上几次发言,非常有说服力,大部分社员表示接受他的见解,赞成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社会革命。”^{[16]12}

月 27 日,“工学世界社”年会召开,蔡和森出席,“作竞日长篇讲话,发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认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主义。”29 日,会议表决倾向时,“各个对现社会都不满足,都以为要革命才行。”^[17]由此工学世界社的社员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为随后旅欧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干部基础。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最早明确提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先行者,他关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系统思考,不仅最先成型,而且完全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列宁建党学说,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而构建的。他的建党思想,与陈独秀、李大钊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原点之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蔡和森虽然没有直接受陈独秀、李大钊指导开展建党工作,但其建党思想是受李大钊和陈独秀思想的启发和引导而形成,并不是孤立于其所处的时代而存在的。换言之,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一样,源自于使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进而实现民族复兴与人民解放的时代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产物。蔡和森能够在完全没有共产国际等外力因素作用下,相对独立地形成完整的建党思想并致力于卓有成效的建党实践,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非“俄人移植”、“共产国际扶植”,而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沈宜甲. 回忆蔡和森[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3] 中共双峰县委员会. 蔡和森传[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
- [5]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 新民学会资料[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6] 萧瑜. 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M]. 北京:昆仑出版社,1984:152.
- [7] 许德珩. 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106.
- [8]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 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蔡和森 110 周年诞辰纪念集[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 [9] 张伟良. 蔡和森的建党思想探源[J]. 中共党史研究, 1992(4):20-26.
- [10] [日]石川禎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11] 陈永发.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62-74.
- [12] 唐宝林. 陈独秀全传[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3] 张国焘. 我的回忆(上)[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94.
- [14] 向警予. 向警予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
- [15] 郑超麟. 郑超麟回忆录(上)[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304.
- [16] 中共双峰县委宣传部. 怀念蔡和森同志[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43.
- [17] 贺培真. 留法勤工俭学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40-41.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Cai Hesen's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Ji Ya-gua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i Hesen was the first who initiated the idea of setting up the CCP, and further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the nature, guidelines, principles, strategies, organization rules, methods and steps of party construction. He also endeavored to prepar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Europe by guiding the practices of party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ai Hesen's thoughts on party construction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request of his era for nation rejuvenation and liberation of its people out of the dilemma of the weaker the poorer. Cai developed his rather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theories on party construction without the help of any external forces such 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Cai's thought together with his efforts in pushing forward the practice of party construction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birth of CCP was not a “transplant of Russia”, nor the “foster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but an inevitable happening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Cai Hesen; party construction thoughts; CCP;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